

加強社區警民合作預防竊盜犯罪

蔡德輝
鄧煌發

竊盜犯罪可說是跨越時空，古今中外所面臨最常發生的犯罪類型，而一般民眾受竊盜犯罪之侵害也最普遍；根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之統計，臺閩地區在一九九九年總共發生竊盜案件二七二、三五五件，獨佔全般刑案的七〇・五%，逮捕竊盜犯罪嫌疑人四〇、六七七人，犯罪率為一二三・七四⁰⁰⁰，是所有刑案之鰲頭。防治犯罪雖是警察人員之職責，但形成犯罪之原因來源眾多，且被害對象卻多為一般民眾，故而以社區民眾為主，結合警察人員之犯罪偵查專業，設法預防竊案之發生，應是社會全民之期望。

壹、社區在預防犯罪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

針對與日俱增的犯罪趨勢，社區民眾遂運用自己的力量來抵制

犯罪，從最簡單的方式：向進入建築物中的陌生人或可疑人物打個照面，漸漸衍生其他較複雜的以社區為導向的犯罪預防模式，而此措施也漸漸受到政府、民間人士、大眾傳播媒體等的重視。然而有幾位學者卻認為，讓社區的人力參與犯罪預防工作的最主要因素是：對刑事司法體系無力控制犯罪的失望挫折感(Frustration)所激發而生。換言之，社區民眾產生集體力量來對抗犯罪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

- 一、犯罪率急遽升高所帶來的高犯罪恐懼感。
- 二、對刑事司法體系有限能力的覺醒。
- 三、刑事司法體系積極鼓勵民眾參與犯罪預防計畫。

社區民眾直接參與犯罪預防工作，其最直接的效益，是可以確保他們生活空間的安全，也就是可以經由參與這些措施，可以避免遭受生命財產的被害，理由如下所述：

- 一、人們總想採取一些可以自衛的措施，或限制自己的舉止，

以避免淪為被害對象。

二、人們試圖讓竊盜犯罪所帶來之損失減至最低限度，他們利用門鎖、防盜器材、安全門等實體性阻絕物(physical barriers)，或利用虛構性阻絕物(symbolic barriers)來限制潛在性犯罪人的侵入，達到預防竊盜的功能。

三、社區每一個份子手牽手，為其居住區附近的犯罪預防共同合作，利用巡邏、守望、護送等方式來達成。

社區民眾直接參與犯罪預防工作，最直接，可能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應該是守望相助工作之實施執行。學者 Whisenand 認為，守望相助計畫主要之目的乃在於：

- 一、促進警民合作，以維護民眾及其鄰近居民財產之安全。
- 二、預防鄰近地區人身犯罪與財產犯罪之發生。
- 三、增進鄰近地區人身犯罪與財產犯罪人之逮捕率。

在我國犯罪預防相關行業之中，擁有犯罪預防專業知識，且從事是項專業技術之人口微乎其微，也常被一般民眾忽視；但反觀我國即將躋身已開發國家之林，以服務性為主之犯罪預防專業人員必漸受重視，而有益於安定祥和生活環境之營造。根據犯罪防治學者指出，犯罪預防專業人員在犯罪預防工作上之角色：

- 一、支持個人犯罪預防行動：
 - (一)犯罪風險管理之指導。
 - (二)安全性調查。
- 二、支持團體犯罪預防行動：

(一)促使了解風險轉移。

(二)加強團體預防行動。

(三)展現非正式社會控制力量。

三、公共政策決策時之指導。

四、研發廣泛之犯罪預防措施。

犯罪預防之成敗，非得有賴正式與非正式之社會控制機構之結合，方得奏其整體之效。正式之社會控制機構為刑事司法體系；非正式之社會控制機構則為社區。刑事司法體系(criminal justice system,簡稱CJS)與社區(community)之間之互動與連結，前者之警察、法院、矯治機構與社區之教育、休閒、職場、保全、心諮等機構，應靠妥適之計畫、資訊系統、教育訓練、立法與犯罪預防措施等整合計畫來連結，才能發揮犯罪預防之整體實效。

貳、社區與社會控制

人類自有社會組織，控制個體行為的規範即已產生。遠古時代，人們即已發覺規範在團體組織中的重要性，它可以有效約束成員的行為。每個社會的規範都有其獨特而與眾不同的功能，然而當社會秩序受到侵害時，社會規範的主要功能就是處罰違法者，這是自古不易的社會現象，因此個人的自由並無法如其願地發揮，必須基於整體社會利益的考量而受到約制，否則社會會形成迷亂的狀態。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並不會時時刻刻感受到社會規範的約制，因為絕大部分的人都在不自覺中遵守社會規範，因為規範彰顯出那些行為是高尚的？那些行為是會受到指責的？那些對人有害？那些對人有益？不管是那種社會，都必須在規範引導下，才能顯現出井然之秩序，對於違反團體規範的人，適當的處分措施是必需的。有些社會規範並未行諸於文字，如：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仰、輿論等，都與行諸於文的法律具有同等的效力。

法律是從風俗習慣或倫理道德慢慢涵養出來的，它是社會控制的主要型態之一，也是正式的社會控制力量。當風俗習慣或倫理道德等規範無法發揮其效果，或顯得有所不足時，法律就是挺身而出，維繫社會安定的最後防線，因為法律的權限極大，所以其內容必須清楚、明確地表達出來，才能發揮犯罪一般預防之功能。法律涉入各領域的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之內，例如：它保護司法及政治體制的正常運作；而刑事司法行政亦保護私人的與公共的利益，同時也維持社會秩序。一般而言，法律的主要功能有下列四項：

- 一、界定關係。
- 二、分配權力以及決定誰應受處罰？應受何種之處罰？
- 三、處理紛爭。
- 四、必要時，以全然彈性原則來重新界定各種狀況與關係。

刑罰主要以人為主要標的，因此刑法就是以刑罰制裁來規範人類行為的根本大法。法律不同於風俗習慣，並不讚許私力的問題解決方式；它也跟其他社會規範有所不同，它並不獎賞那些遵守法律

的人，只會懲罰那些違反它的人；因此，絕大部分的法律均以追訴或懲罰犯罪人的負面增強方式來達到社會控制的目標。雖然法律對於許多人的行為是必要的，但是卻也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其他社會規範之控制功效，有時它們甚至比法律還來得有效，例如：道德及輿論，它們所形成的社會烙印與標籤效應，對於一些想違反某道德行為的潛在性犯罪人而言，其嚇阻效果往往超過法律的起訴、懲處效果。

參、刑罰威嚇的犯罪預防效果

一般民眾對於各類型犯罪刑罰之最高額度並不清楚，但卻都知道，在犯罪之後必然遭受國家刑事司法體系之制裁。因此，刑罰制裁的嚴厲性(severity)、面對刑罰的確定性(certainty)、以及刑罰的迅速性(promptness)等三項考慮因素，都會影響到犯罪行為理性選擇結果。

一、刑罰之嚴厲性

一般立法者均相信提高刑罰懲處之最高額度，對於潛在性犯罪人在面對是否選擇犯罪行為時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在一般實務操作上，它似乎無法有效減少犯罪發生率；若要講得確定點，嚴厲之刑罰只可能在某特定的時間、地、人發生嚇阻之結果。例如，在

十九世紀時，英國就有超過兩百種的罪行可處以死刑，結果陪審團往往將犯罪人處以不起訴處分，以免眼睜睜地讓犯罪人步上絞刑臺。過於嚴厲的懲罰，尤指死刑，往往給正要或正在實施而尚未完成整個犯罪行為的人「一不做，二不休」的「豁出去」的可怕想法，例如：結夥搶劫強盜銀行的「夥人」，在搶得十萬元之後，按原計畫應即一走了之的，但一想到有那麼多的行員、在場民眾看見他們的罪行一死刑之罪，他們可能因此而取走在場所有人的性命，以順利逃避警察偵查，免去死刑之制裁。因此，嚴厲之刑罰並非預防犯罪的「萬靈丹」、「萬金油」，而是包青天的「尚方寶劍」，對於死刑之法律構成要件，應審慎立法、執法。

二、刑罰的確定性

比刑罰之嚴厲性更具威嚇效果的應屬刑罰的確定性。約在兩百多年前，刑法大師也是犯罪古典學派代表人物 Beccaria 曾說過一段話：「刑罰的確定性看似溫和，但它帶給民眾對罪行更深刻的印象，它結合了希望與免疫(hope and immunity)效果，遠超過它所帶來的恐怖與畏懼。」因此，只有一年刑罰的罪行與百分之百的逮獲率之嚇阻效果，遠比廿年刑罰罪行與百分之五的逮獲率要來得高。

刑罰的確定性嚇阻效果的首要關鍵，必須先確知實際的犯罪案件數有多少？警方受理、記錄報案的件數又有多少？又逮捕了多少的嫌疑犯？然後又有多少的嫌犯被移送？被起訴的又有多少？罪行

被判決確定的又如何？真正遭受到刑罰制裁的又有多少人？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我國為遏抑某些特定犯罪而另立加重刑罰額度的特別刑法極多，一味篤信刑罰嚴厲性的效果，卻忽略強化刑事追訴能力，誠乃法律之一大憾事。試想：如果警察有能力把絕大部分的竊盜案件破獲，亦將絕大部分的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換言之，將目前竊盜案件一、二成的破獲率提昇到八、九成的話，讓認為「划得來」的潛在竊犯「划不來」，如此必能有效保障民眾財產安全。

然而令人感到意外的一項研究結果，是英國 Willcock 與 Stokes 針對十五至二十歲男性青少年之調查研究發現，出現在法庭之上的羞恥感以及犯罪後所為之刑罰輕重，確有某程度之嚇阻效果，但卻不是影響他們在決定實施犯罪所考慮的最重要因素，它比不上失去家人疼愛及工作所帶來之嚇阻效果。

雖然在當時英國的研究結果如此，但是否可應用於廿多年時間的改變與社會環境空間迥異之我國，尚無相關性之研究可資支持說明；另外是否也適用於其他年齡層或其他犯罪類型等，亦須進一步驗證。不過；有一項研究指出，刑事司法體系外，且強調刑罰嚴厲性與確定性之懲罰措施，對於公私機構內所屬員工部屬之違反規定之行為，亦有相當驚人嚇阻效果。此研究同時發現，年輕之員工部屬較年老者不畏懼上述措施，可能是因為年少者之守法觀念較差，或遭「炒魷魚」後所損失之錢財較少，也或者是因為他們比較不容易遭受其他員工同仁所唾棄的關係使然。

二、刑罰的迅速性

除了上述兩種刑罰措施外，可影響犯罪行為之考量因素的是刑罰的迅速性。同樣地，對於刑罰迅速性的實證研究數量也相當有限。嫌犯在犯罪行為發生後不久，即遭受到懲罰，根據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以及制約反應理論(operant conditioning theory)，針對個體本身之特殊嚇阻(specific deterrence)，或者是對於社會大眾的一般嚇阻(general deterrence)也好，都具有相當強大的震撼效果，愈接近犯罪行為時的刑罰，其負面增強效果也愈強，也就愈能預防犯罪之發生；經過一段長時間才得到懲罰，人們早已將此案件忘懷，也就無甚嚇阻效果了，誠如 Beccaria 所言：「...刑罰之迅速性頗具奇效，因懲罰與行為之間隔時間愈短，一般人對懲罰與犯罪行為之記憶猶新，一者(犯罪行為)為因(cause)，另一(懲罰)則為無法避免之效果(necessary inevitable effect)。」

Beccaria 提倡之論點，乃在十九世紀犯罪實證學派興起後，被稱為犯罪古典學派，兩派學者所持之觀點迥異，故對於社會控制之焦點的看法南轅北轍，古典學派學者認為應使用嚴厲、固定之刑罰達成嚇阻性犯罪預防效果；而實證學派則特重犯罪矯治教化之效果，兩者之大略相異點，特示之如下表，以方便比較：

表一 早期犯罪學派的意識型態比較

項 目	古 典 學 派	實 證 學 派
創建理論模式者之中心思想	改革刑事司法體系	犯罪人科學化之研究

對人性的看法	自由意識，功利主義	決定論：生物、心理、社會因素
行為責任	有	無
防制犯罪方法	確定犯罪成本高於所得利益	消除犯罪成因
社會控制之焦點	法律：使刑罰之嚴厲超過犯罪所得利益 司法裁量不適用；確定犯罪成本高於所得利益，對每人均應有確定之刑罰，刑罰與犯行對等 刑罰應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確定刑之適用)	犯罪人之狀況：犯罪人之狀況因人而異 適用司法裁量：因犯罪人個別差異，法官量刑需考量到不定期刑
社會控制之目的	嚇阻：設若犯罪成本超過犯罪所得(犯罪划不來)則不會犯罪，對犯罪人之刑罰亦可嚇阻一般民眾犯罪	對犯罪人施以更生重建

刑罰威嚇效果除隨根基理論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差異外，政治制度之不同，亦為影響刑事政策差異之重要因素。就筆者蒐集美國之相關文獻指出，美國政治意識形態：保守派、自由派、激進派，各對於社會控制力量所能達成之效果等，以表格列示如表二。

表二 美國犯罪預防之意識型態：政治與刑罰

項 目	保 守 派	自 由 派	激 進 派
資本觀與政治制度	基本原理原則係完善的	需改進一更佳之社會與經濟品質	基本原理原則不完善且有剝削性質
犯罪成因	社會欠缺規範：傳統機構與價值瓦解	貧窮、種族歧視及社會之不公平導致民眾犯罪；社會未滿足民	資本家剝削情沉導致富者剝削窮者，窮者

主要價值	犯罪問題來源	立論焦點	防制犯罪方法	
社會秩序：法律與治安	街頭犯罪	犯罪被害人與無辜之民眾；懲罰犯罪人以確保這些團體	重建社會秩序與規範：重建使美國強大之傳統價值觀以嚴刑峻罰增益犯罪風險	寬大之刑事司法體系
個人基本權益之保護，對弱勢者更公平、更好的人性化處遇	街頭與白領犯罪	犯罪人；協助困窘之犯罪人，預防社會未來被害	經由改革改善社會秩序：改善社會制度以滿足弱勢民眾需求之刑事司法體系	民眾需求，而犯罪恰是社會體系不健全之表現方式
整體經濟與社會之品質：沒有階級，沒有剝削	資本家與富者之犯罪	天賦的不人道制度	消滅資本制度：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秩序	掠奪其他人之狀況

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我們往往需要一些由政府施加給我們的規範，藉以從中探悉我們之所求為何；若沒有了這些規範，社會互動關係將迅速地淪入剝削、破壞、衝突的腐敗境地。各國有各國的法律，甚至在一個國家中，各州的法律也有所不同，某個國家或州認為是犯罪行為的，在另外一個國家或州卻不如此認為，例如我國的吸食安非他命的行為是犯罪行為，但許多國家並未如此認定；像阿拉伯合法的一夫多妻制，在許多國家是被列為法所不容的犯罪行為。依一般的標準，犯罪只是那些侵害到社會利益而必須接受到刑

罰制裁的行為罷了。

刑罰懲處、制裁措施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嚇阻潛在性犯罪人，使他不敢犯罪。嚇阻並非僅靠增加試圖犯罪者的恐懼心理，其實它還運用到正面的道德影響力，藉著法律處理過程的教育效果，讓廣大的民眾瞭解到法律的界限。此外，法律還把大眾對危害到大家利益的犯罪行為，凝聚成一般深惡痛絕的態度，以聯手共同對付那些實施犯罪的人。這種因法律而生的觀念與態度，在犯罪預防工作的推展上是相當重要的，設若一個沒有禁止行為的法律規定，或沒有指責罪行的聲音之社會，民眾可能會反對此一法律的存在，因而對政府施壓以廢除此寬大惡法。

肆、利用情境犯罪預防策略預防竊盜

美籍知名犯罪預防學者 Clarke 於一九九七年創立了「情境犯罪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之策略，主要係源自古典學派之論述：犯罪行為係行為人深思熟慮之後，認為犯罪比不犯罪有利，進而發諸行動的一種事件；因此，犯罪行為是一種「理性抉擇」的結果。影響到犯罪人理性思考的要件，包括：標的物的價值、週遭環境對該犯罪行為之容忍程度、作案是否容易得手、犯案時被發覺的風險等等。

以情境因素促進犯罪預防的策略，可簡稱為「TIGER」原則。

實施以來，已漸受世界各國所肯定，並有許多成功的案例支持，特別是在預防竊盜案件之發生，其成效更是受到肯定。為提供社區民眾避免竊賊臨身的方法，同時也提供員警執行犯罪預防宣導參考之用，特將其內涵介紹如下：

T：標的物價值(Target's Reward)：竊賊盯梢的財物價值；

I：犯罪誘因(Inducement)：竊賊犯案前理性考量的總和；

G：罪惡感(Guilty)：社會對竊盜行為的譴責與忍受程度；

E：犯案困難度(Effort)：竊賊下手行竊所需花費的心力；

R：現場風險(Risk on the spot)：實施竊案時被監控的危險程度。

竊盜犯在下手行竊之前，均有所謂的「情境誘因」(situational inducements)，假如行竊的目標物價值愈高，下定決心行竊的可能性就愈大；如果存在能激發竊賊產生罪惡感之物存在，還必須花費一番工夫才能得手，或者存在高度被辨認、被逮捕的風險的話，竊盜犯就會打退堂鼓，達到預防竊盜犯罪發生的目的。簡式如下：

公式一： $+I = +T - G - E - R$ (竊盜犯理性抉擇之準則)

公式二： $-I = -T + G + E + R$ (預防竊盜犯罪發生之準則)

公式一表達了竊盜犯行動前的思考方向，而公式二則是本文之要點，亦即要能有效地預防竊案之發生，致令潛在性竊盜犯打消行竊之意念，其具體作法需結合民眾與警察之努力，方可克竟其功。茲分從四方面說明：

一、減少財物價值

(一)民眾方面

有錢並非罪過，但若因而遭致被竊，非但使自己財物蒙受損失，同時也為社會製造了一個犯罪人，那就是罪過了。因此，顯目的皮夾、穿戴珠光寶氣、豪華家宅、酷炫汽機車等都是誘惑潛在性竊盜犯覬覦之重要目標；減少自己淪為竊賊盯梢的目標，應設法減少財物的暴露，不要使人覺得很有錢的樣子。

體積小、變賣容易的貴重物品，可在適當處烙印記號，並編列清冊，可使財物因而無法變賣，也可增加破案後辨認財物的根據，一舉數得。

(二)警察方面

把握平日與民眾接觸，或執行各項警察勤務之時機，例如：戶口查察、巡邏、守望、偵辦刑案等，尤其運用犯罪預防宣導的機會，設法說服被竊高風險之居民，放棄暴露財物之生活型態，代之以簡樸的生活，如此非但可減少居民被害之機會，同時也提昇了警民關係的質與量。

二、增加竊盜行為之罪惡感

(一)民眾方面

道德良心的激發，物權觀念的養成等，須靠家庭、學校甚至社會等各類型教育的長久塑造；因此，父母、老師、大眾傳播媒體工作者、公眾人物等，除以身作則之外，對於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

也應適時地加以譴責，促使竊賊不願犯。此外，酒類會減弱道德意識，提倡健康的喝酒文化，不過度飲酒，也是預防竊案發生的重要做法。

（二）警察方面

利用村里民大會或各種集會場合，宣揚尊重他人物權的正確價值觀，加強宣導醉酒之惡害，並藉分析轄區竊案發生之相關資訊時機，適度地鞭撻竊盜手段之卑劣，並呼籲民眾摒棄此類見不得人的作為，以建立民眾共同防衛體系。處理竊案時，應特別留意竊賊之合理化技巧，並堅定地杜絕其行竊的任何理由，使之無藉口可推託。

三、增加行竊之困難度

（一）民眾方面

強化貴重財物的穩固措施，例如鎖鑰管理、與固著物聯結、大廈出入管制、建築安全設計、可能致生竊盜之器械管制等等措施，須注意的是，從事這些防衛財物安全作為之際，切莫因而引發潛在竊盜犯之覬覦，掉入「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泥沼，反而容易遭致竊賊之光顧。

（二）警察方面

除利用適當時機向社區民眾宣導注意貴重財物之防竊措施外，對於制服員警之巡邏、守望，鼓勵、輔導金融機構檢測安全措施，僱用保全人員執行守衛、運鈔等戒護安全之工作，加強對當舖之查

察管理，嫌疑竊盜犯的臨檢、盤查等，均可發揮中止潛在性竊盜犯之犯案動機，達成預防竊盜犯罪的目的。

四、增加行竊時之風險

（一）民眾方面

竊賊最愛的是：社區居民之間的相處不融洽，「老死不相往來」的冷漠社區，頹廢而沒人整理的環境，沒有巡守隊等守望相助相關的設施的社區，社區居民、商家，甚至攤販之間構成的防衛體系，亦即所謂的「自然監控」(natural surveillance)力量的發揮，以及在適當地點裝設閉路監視系統，甚至運用集體力量逮捕竊賊等均可戡止潛在性竊盜犯的行竊動機。

（二）警察方面

民眾對警察角色之期望，是警察如何而能增加竊案的刑事追訴能力，亦即善加運用科學犯罪偵查能力，提昇竊盜案件的破案率。因此巡邏勤務的規劃，注意犯罪的「熱點」(hot-spot)的巡邏時間、路線、方式、密度等，使竊賊不敢犯、不能犯，因為竊賊考量被逮捕的可能性遠大於被判刑期的長短破案率，給潛在性竊盜犯暗示行竊最終是不划算而愚笨的結果，也就達成了竊盜犯罪預防的目標。

伍、警察社區計畫

警察社區計畫(police community programs)主要結合警察與社區的力量，共同為打擊犯罪而努力，其目的係基於「事前的預防勝於事後的處理」之理念，學者 Bent 與 Rossum 認為此計畫中涵括三個要素：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擁護警政(advocacy policing)、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茲分述如下：

一、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

此措施包括建構警民暢通之溝通管道、建立優良之警察形象、促進警民關係等等。

一一、擁護警察(advocacy policing)

在犯罪預防的領域中，警察與民眾及其他相關機構的關係，須以協調為基礎，以命運共同體的團隊精神對抗犯罪，共同合作解決所遭逢的問題，依此原則，最好在警察機關裡面設置警民股(科、組)，全力地為社區提供必要的支援與協助，為了贏得社區民眾對警察的信任，這個特殊的警察單位就擔任政府相關部門或其他警察單位與民眾之間的橋樑(go-between)，此種型態是否適用在整個社會或比較大範圍的社區，根據美國的實際推展所得經驗，此種方式比較容易在小規模的社區中順利推展，因此，擁護警政的措施亦有其限制存在。

一二、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

此項計畫須結合良好的公共關係與對社區有利之服務設施，包括廣泛之活動，如：至學校演講、協助失業人口就業、法律常識宣導與講解等，社區預防計畫的目標，主要還是在於獲得民眾的合作，共同抗制急遽上升的犯罪率，社區民眾在處理可疑人事物時，即成警察最佳之「千里眼」與「順風耳」。

Bent 與 Rossum 還特別舉出了警察社區計畫在犯罪預防上之實務操作典範，如下所述：

一、戡止犯罪行動(Operation Crime Stop)

此一措施相當容易實施，警察機關只要提供特殊的電話號碼給民眾檢舉犯罪專用，例如我國各警察機關均以「一一〇」為報案電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還為了便利全國民眾舉報犯罪案件，特別向交通部申請二支免費檢舉專線：(〇八〇)二一一五一一至一一，此外還舉辦一些活動以促進民眾的參與，或在每年的六月及十二月舉辦的擴大預防犯罪宣導月，以教導民眾防範犯罪的常識。此措施至少具有兩項優點：一是促進社區成員的凝聚力，另一則是強化了社區的自我防衛警覺性。

一一、社區居民巡守計畫(Citizen Block Watch Program)

此計畫主要以社區內的居民來監視其他的房子，目的在於預防日間侵入住宅竊盜之發生，社區居民之間都有互相聯絡的電話號

碼，擔任巡守之人員特別留意進出住宅前後門的人，一發現可疑之人事物，隨即向當地警察機關聯繫，這種計畫欲求長期之推展，必須有充足的經費與人力，再加上定期召集會議來維持。

二、獨身婦女行動(Operation Lone Woman)

這是實施在美國德州的一項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主要在於協助機車女騎士免於受害，以及維護夜間街道的安全。此計畫的第一個階段，是教育婦女避免淪為犯罪被害對象。我國在此方面最具成效者，應屬潘維剛立委所組成的婦女基金會，除了協助貧困失依的婦女同胞外，也透過舉辦各種演講會，提供許多婦女防暴方面的常識與技巧，對於促進婦女安全有相當大的效果。

被害者學學者 Schaffer 指出，任何一個社區性計畫的首要關鍵，在於當地居民的參與(involvement)，但是如果他們的參與缺少鼓勵的話，計畫終將歸於失敗，警察在社區性計畫中，可以呼籲當地居民挺身參與，但最重要的，還是他們本身積極主動的參與，才是維持計畫持久的要件。社區計畫成功的標準，可以當地居民之責任感程度(the level of responsibility)之高低加以衡量，然而一方面要讓居民自給已推動計畫，另一方面卻又要激發他們的責任感，並非易事。

要激發居民對特定之犯罪預防計畫的責任感，也就是要讓他們有接受是項計畫的意願(willingness)，最重要者為志工(volunteers)參與動機(motivation)之獎勵措施。警政學者 Sherman 認為：「... 激

發及維持志工賣力工作的關鍵是動機。」擔任志工極可能很快就產生倦怠感，因為擔任社區巡守是一件簡單又無聊的工作，而且巡守監控對犯罪預防之效益，至今仍無實證研究結果可資支持，此問題同樣也會發生在其他以社區為基礎的計畫上，簡言之，志工在新計畫實施時會有滿腔的熱忱，但是卻無法經過時間的考驗，時間久了，熱心很容易冷卻下來。

陸、結語

許多研究證據顯示，一般社會民眾對於犯罪預防工作表現得相當冷漠，另一方面我們也從各種文獻資料中得悉，單靠警察以及法院等刑事司法體系內的力量，絕無法達成犯罪預防之理想目標，因為警察受主客觀因素之限制，並無法偵查所有已在社會之中發生的犯罪，而法院同樣也無法完全以刑罰裁決來有效嚇阻犯罪人。因此唯一較為可行之道，就是設法阻擾犯罪，增加犯罪困難程度，使之無法順利完成。

大部分的民眾都渴求生活在人人都遵從法律規範的社會，犯罪案件之增加，勢必給社會大眾帶來喪失生命財產的痛苦威脅。既知如此，身為社會一份子的每一個民眾，若均能體認犯罪預防之重要，且願善盡自我防衛功能，則犯罪被害案件一定大為減少。民眾自我防衛常識之灌輸，就必須靠我們警察同仁善盡預防犯罪宣導之責，

並從中促進警民關係，並肩共同打擊犯罪，如斯則長治久安之生活環境並非烏托邦幻夢，此一理想是可以經由所謂「預防犯罪，人人有責」加以達成的。

大家都知道，犯罪是社會無可避免的正常現象，只要人類存在一日，犯罪亦將伴隨人類一日。雖然如此，我們不能就這樣撒手不管，我們仍應盡一切方法與之搏鬥，以使其減至最低限度，以社區為導向的犯罪預防計畫及活動，於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每一個人均不能置身事外，均應積極地負起對自己、對他人的預防責任。

（本文作者：蔡德輝為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犯罪學博士，中央警察大學校長，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理事長，鄧煌發為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中央警察大學副教授兼組長，中華民國犯罪學學會理事。）